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編輯二十一世紀第一期《二十一世紀》雜誌，編者最大的感觸是：作為傳統形式的學術文化期刊，本刊如何面對電子媒體的衝擊？網上閱讀使得作者和讀者的界限日益模糊。在新世紀中，作者、讀者和編者又是一種甚麼樣的關係呢？從1999年起，我們逐步做到每篇文章全部上網，並開設了網上三邊互動；雖然網上讀者不斷增加，但是，願意認真針對本刊文章留言的讀者卻不多。希望本刊讀者用傳統方式（投書）和新興方式（上網），積極參與本刊討論。

——編者

關於計量方法

貴刊1999年12月號刊登了一組運用計量史學方法研究「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文章，應該說計量方法的確有助於匡正那種浮面、主觀的印象式的思想史研究。但同時也必須意識到這種方法的限度，簡單的數據統計到複雜的函數圖式，乃至更加細化的頻率計算和意義分類，都不能根本上改變計量研究的「整體化」、「同質化」趨勢。即使計算出某個語詞在某本刊中出現了多少次，如果不進一步進行更具體

的文本分析，那麼也不能分辨出這個語詞是作為一篇文章的關鍵概念而存在，還是無關緊要的修飾用詞。更何況一本刊物就是使用若干篇文章「構建」起來的「文本」，包含了那個語詞的文章是代表了編輯方針的「發刊詞」或「編者按」，還是為了顯示刊物能夠容納異見而發表的「讀者來信」？這篇文章是用大字號刊發的頭條，還是小字號勉強擠入「通訊欄」的消息？……這些細節都被統計的數據忽略了，可對思想史研究來說，注意這些細節，並且從細節中分殊出概念的游移、變化和滑動以及各種結合上下文的策略性使用的情況，卻是大有講究的。

另外，計量研究的統計對象也需要慎重選擇，比如研究《新青年》對「民主」一詞的使用，當然要統計《新青年》和與它立場相近的《新潮》、《每周評論》等刊物中「民主」一詞出現的頻率，但據此申論五四時期人們對「民主」的理解還略顯武斷。在我看來，要給《新青年》的「民主」觀念在五四思想史上予以恰當的定位，僅就計量研究而言，還需要統計有着更大讀者面的《東方雜誌》對「民主」一詞的使用情況，以及言路和思路迥異於《新青年》的《甲寅》、《學衡》等對「民主」的

使用。由此看來，中國現代思想研究要走的路還很長，計量研究只不過邁出了一小步。

羅崗 上海

2000.1.7

計量統計與意義分析 相結合

貴刊1999年12月號金觀濤、劉青峰的〈《新青年》民主觀念的演變〉，此間讀者朋友頗有佳評。幾十年來，學界談五四言必稱「民主」和「科學」，但對這兩個中國啟蒙運動的關鍵詞，幾乎無人深究。金、劉的論文既有反映宏觀趨勢的計量統計，又有具體的意義分析，追溯「民主」在近代中國的語義矛盾和觀念轉化。該文揭示了《新青年》的民主觀念從政治而倫理而經濟、從憲政民主而平民主義而社會主義的意義演化脈理。此文無疑是近年來五四思想史研究難得的佳作之一。

我認為，該文的另一啟示在於方法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一直襲用思想家個案和思想文本的微觀研究方法，而缺乏觀念史的中觀研究和思想史系統的宏觀研究。金、劉的論文以及相關一組文章，可謂觀念史研究的新嘗試。

高力克 杭州

2000.1.12

犧牲與公平

一口氣讀完貴刊去年12月號陳意新的文章，心情難以平

靜。因為，本人正屬於文章所分析的「從下放到下崗」的一代。多年來，我目睹同代人的坎坷經歷，也在問為甚麼？怎麼辦？但是，我找不到恰當的語言來講清楚自己的感受，陳意新的文章用極其簡明的詞彙——「下放」和「下崗」，高度概括出我們這一代人的主要經歷，並呼籲為這一代人尋回一個公道。

正如該文所概括的，我們這一代人成為毛澤東革命時代與鄧小平改革時代這兩個截然不同歷史時期所卸下的包袱。在前一時期，我們付出的是青春、失學、理想破滅；在後一時期，我們提早退休，被社會淘汰。也可以說，我們這一代為中國後半世紀的革命試驗與社會全面轉型付出巨大代價，作出犧牲。問題是，如何公正、公平地對待這一代人？例如，像楊帆這樣十分著名的經濟學者，在升職問題仍要受到「英文考試」的刁難。而我們這

一代中大多數默默無聞已下崗的人，只有無奈地在公園中消耗時光。我想，為這一代人尋回公道，可能的途徑是在建立新的社會保障制度時，如養老金（這一代人已不可能再供款）、醫療（這一代人正進入最需要醫療費的年齡）制度，應考慮給這一代人特殊的補償。

晉戎 武漢

2000.1.15

兼聽則明——我看格魯克斯曼訪談

貴刊1999年10號刊登了格魯克斯曼的訪談，使我們了解到前南斯拉夫以及後來的南聯盟是如何屠殺阿族平民的，而北約以及美國是在何種情況下不得已才出兵干涉的。國內媒體幾乎眾口一詞地認定北約的行為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是甚麼捍衛人權原則。此外，貴刊登的幾篇有關文章，都在學理層面討論主權與人權這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闡述，他們的文

章已經做得十分出色，無須我再多言。

我想說的是，為甚麼人權紀錄不那麼好的國家政府一般來說總是反對人權高於主權說，而堅決主張主權高於人權？他們難道真的是為了民族的振興與國家的安定？或者真的是為了謀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等？還是另有原因？甚麼樣的國家在別國發生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的時候保持沉默或竟然暗中支持？我想這不難理解。一個人權紀錄不佳的國家，大概是不太可能譴責別國的專制暴行的，因為它自己的「門坎兒不清」。一方面別國的政府會反唇相譏：「你的人權紀錄又如何？」另一方面，國內的人民也會借此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感到政府「對人馬列主義，對己自由主義」。所以大凡自己不尊重人權的國家，當然也決不會譴責別國的踐踏人權行為（哪怕是觸目驚心的行為）。

一丁 北京

1999.12.7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電腦製圖：林立偉；文字：金觀濤。

頁42-43 王苗作品。

頁70 《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頁98、99。

頁81、97、98-99（下）、111、131、封三、封底 資料室圖片。

頁98-99（上） Michelangelo Antonioni and Wim Wenders, *Beyond the Clouds* (1995).

頁98-99（中） Wim Wenders, *The End of Violence* (1997).

頁100、103-106、108 Wim Wenders, *Tokyo-Ga* (1985).

頁109 *New York Times*, 18 June 1999, p. A1.

頁112 張寧提供。

頁121 梁志學主編：《費希特著作選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插頁。

頁138 何暉、方天星編：《一寸千思：憶錢鍾書先生》（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插頁。

頁139 Rutilio Manetti, *San Bernardino*.

頁140 譚安傑：《中國企業新體制——督導機制與企業現代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封面。

頁145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1988- ），封面。

頁148 《思與言》（台北：思與言雜誌社，1963- ），封面。

頁150 《學術思想評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封面。

頁153 《公共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95- ），封面。

頁156 《開放時代》（廣州：開放時代雜誌社，1989- ），封面。